

周代礼仪的等级性特征初探

冯盛国(宝鸡文理学院 讲师)

摘要：周代社会当中礼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周代社会的结构一致，周代礼仪也呈现出等级性的特征。通过对周代礼仪等级性元素的梳理，周代礼仪的本质特征——等级性特征就会彰显出来。

关键词：周代礼仪 等级性 本质

周代礼仪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礼仪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融习俗、道德、政治经济制度、思想准则为一体，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中体现。狭义的礼仪指的是以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完整的物质和意识的规范和标准，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的一套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贵族和平民都必须遵守的制度法则。本文主要涉及狭义的物质形态的礼仪。周公制礼作乐之说近代学者或赞成，或反对，然而皆无确证，不能使人很好的信服。王晖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解决了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的问题。^[1]我们可以认为，周公确实对历史上礼仪制度作了总结，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本文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对礼仪的等级性进行梳理，以企对周代礼仪等级性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本质。

一、礼仪在日常生活方面的等级性

1、饮食的等级性

周代的饮食中人们的主食是粮食，主要有五谷、六谷、九谷几种说法。但总体上说，主食不外有黍、稷、粱、麦、菰、秫、稻、麻、豆。^[2]在主食的种类上，王公贵族讲究膳食的调和：“羊宜黍，猪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菰，凡君子之食恒放也。”（《礼记·王制》）这是礼所认为最适宜的饭菜搭配法，也是君王和贵族大夫用膳的共同准则。而普通庶民的日常饭菜，则是以豆饭藿羹为主。豆类在古代是救荒济贫的粗粮，正如《战国策·卷二十六》云：“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饘糟

糠。”《诗·小雅·小宛》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史记·张仪列传》也说：“韩地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大抵菽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饘糟糠。”可见，菽豆是一种很低等的粮食，在灾荒之年往往作为救灾应急之用。

在周代肉食是很贵重的，只有贵族和年长之人方才可能吃到，《左传·昭公四年》载古代颁冰法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位与大夫，乃得食肉。”当时大夫在朝廷供职，公家供其膳食，日双鸡，即每餐一鸡。而普通庶民百姓，是很难吃到肉的。《礼记·王制》上严格规定，庶人无故不得食珍。因此平民只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诗经·豳风·七月》）普通百姓只有上了年纪才能吃肉。《孟子·梁惠王上》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食肉为贵族，食藿为平民，因而“食肉”与“食藿”也就成了不同等级的身份符号，这里的分别是相当明显的。《说苑·善说》记载春秋时东郭朝上书晋献公，问国家之计，献公便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祖朝曰：“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臣等藿食者宁无肝脑涂地于中原之野？”又《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长勺之战，乡人劝曹刿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些资料都说明当时确实存在着饮食的等级化的情况，不同阶层的人完全可以用不同的食物来代表，就足以表明饮食已经符号化了。尤其是贵族与平民阶层，中间更是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周代除了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院级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周代礼仪的等级性特征研究”（ZQ0710）

贵族平民之间的饮食差别之外，年长与年青也是区分饮食等级的标准之一。

菜肴的数目也因地位和年龄而异。在周代上层的贵族是实行分食制的，即每个人个别进餐，各人跪在自己的餐席上，旁边放一个矮几作为一个小案子或倚靠之用。在每人之前或旁边放一组餐具，盛着这一餐所用的食物和饮料。餐饭包括谷类食物、肉菜的菜肴和水酒。每人每餐可吃四碗饭，但菜肴的数目和种类则依地位与年龄而异。《礼记·礼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再比较一下平民的饮食之礼，在《礼记·乡饮酒礼》中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礼是平民的礼仪，在这种礼仪当中，即使是最为尊敬的长者，也只相当于一个下大夫平日的生活水平。

肉食也是分有等级的，对于肉食的规定，《礼记·王制》上云：“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彘，庶人无故不食珍。”明确表明了不同的等级对于肉食的规定。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测定古代墓葬人体骨骼的过程中，发现不同阶层的人由于饮食的不同，骨骼成分也就不同，从而证明贵族菜肴以肉类为主，平民菜肴以蔬菜为主。不同阶层的食谱划分极为明显，这与文献的记载相符。

我们还可以看出，周代除了贵族平民之间的饮食差别之外，年长与年少也是区分饮食等级的标准之一。可见，除了政治上的标准，周人尊老、敬老也在等级上有明显表现。

2、服饰的等级

周代服饰在表现等级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周天子和诸侯以华袞大裘博袍鲜冠为服，卿大夫以高等裘皮为服，士阶层以下一般以布衣、低等裘皮和短衣紧身袴为服。头上之饰，如冕、弁、冠等；衣服如后之袂衣、丧服之斩衰、齐衰等；种类颇繁。在《礼记·玉藻》当中对天子、诸侯、大夫、士的衣服有明确的规定：“玄冠朱组纓，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纁纓，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纓，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纓，士之齐冠也。缁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缁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纓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缁

武，不齿之服也。居冠属武，自天子下达，有事然后纓，五十不散送。亲没不髦，大帛不纓。玄冠紫纓，自鲁桓公始也。”这一段文字说明了不同等级的人服饰的情况。天子、诸侯、士、平民在冠的颜色和纓的颜色均有具体的规定，否则就是违礼之事。可以看出，颜色的等级大致的顺序依此是朱、丹、綦到素的顺序。以朱丹为贵是和周人尚赤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衣服的纹饰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在《尚书·益稷》中云：“余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黼、黻、希、肃，以王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人们对这十二种图案的理解不同，按照孔安国的说法，一种案分别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正“弓”和反“弓”），天子的服装用十二种图案，诸侯用龙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士用藻火两种。一般庶民为素衣，不使用图案装饰。在图案的使用上，可以上兼下，而下不能兼上，等级界限非常分明。这些图案中，不仅将日月星辰、花草草木等自然事物搬在服饰上，而且这些事物还有各自的象征意义。“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在古人心中被认为是登天之道，因为周王是天子，所以这四种图案专供周王使用。天子通过“山”而达到同“天”（日月星辰）的交流和融合，从而达到“天人合一”。“龙”象征着王权，“华虫”近于凤，只有天子和三公才能用这两种图案。“黼”是斧形象征决断，同时也是权力。“黻”以相背之弓象征善恶分明。“粉”、“米”代表食禄丰厚，“藻”有文饰，“火”焰向上，士以上才能用。这十二种图案代表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阶层身份是紧密相连的，等级的意义非常明确。

从文献记载可知，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产生了用服装颜色区分尊卑的观念。周代的礼乐制度确立以后，颜色用以区分等级的功能日益增强，其使用范围主要贵族的车马服饰服色以赤、玄一色为尊。

《诗经·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三白赤芾。”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论语·乡党》：“红、紫不以为裘服。”古时大红色为“朱”，是很



贵重的颜色。“红”和“紫”同属此类。除赤色以外，玄色也被周人视为贵色、吉色，贵族常用黑色衣料来制作礼服。于祭祀、婚仪、冠礼等庄重场合穿。

《荀子·富国》篇：“诸侯玄衣冕。”《诗经·小雅·采芣》：“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礼记·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诸侯玄端以祭”。周代贵族佩玉，所以在具体的玉上也就有区分，同样在《礼记·玉藻》当中：“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纆，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纆，大夫佩水苍玉纯组纆，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纆，士佩瑀玟而緼组纆。”对于不同的等级的人佩玉也有相当繁密的规定。

周代的图案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是衣服颜色的等级性还没有像后世严格的执行。隋唐以后，官服颜色形成一个高度等级的序列，即“品色服”制度。

一般说来，周代的服饰可以分为冠服与常服，冠服是很正规的礼服，常服是一般人日常所穿，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服装。在周代服饰当中表现出等级性还在于丧礼礼服上面，则规定更加繁复和细密。

二、宫室宗庙、陵墓棺

槨礼仪中的等级性

宫室建筑的等级，包括宫室、明堂、宗庙等。

“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礼记·礼器》对于明堂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以确定身份的高低。

明堂始于周，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大戴礼记》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周礼·冬官》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礼记·月令》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总章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吕氏春秋·孟冬记》就记载了当时专门有官员“营丘垅之在大小、高卑、薄厚之长度，贵贱之等级。”《荀子·礼论》：“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说法，参照《檀弓上》、

《丧大礼》的记载，天子当时是五棺二槨，诸侯是四棺一槨或三棺二槨，大夫为二棺一槨，士为一棺一槨。《礼记·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长六尺。周代规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就是说天子所用除贴身的内棺外，外面还套着四重外棺，总共五层。每一层都有特定的名称，最外层叫大棺、第二层叫属，这两层棺用梓木制作，又统称梓棺或梓宫，第三层叫槨或椁，用椁木制成，第四、五层为用水牛皮和犀牛皮制成的革棺（也有可能革棺只算一层，另有最后一层里棺）。诸公以下由内至外递减，到士这一阶层，就只有一层大棺，不用套棺了。不仅如此，棺木大小厚薄、内外装饰的用料花样，也都有严格的规定：“君（此指诸侯）大棺八寸，属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君盖作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帖尸之棺内壁装饰，均作红、绿二色丝绸，以金钉、象牙钉固定，大夫用黑、绿二色丝绸，以牛骨钉固定，士只用黑色丝绸，以牛骨钉固定。棺外油漆的颜色和花纹图样也各不相同。

套棺是一层一层紧套在一起的，如果在棺或套棺之外隔较大的空隙再加一层，就叫做槨。《礼记·丧大记》云：“棺槨之间君容柩，大夫容壶，士容鸛。”又说“君松槨，大夫柏槨，士杂木槨。”可见在木料的选择上也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在《易·系辞下》提到上古的墓“不封不树”，也就是葬地不起坟，也不种树以设标志。孔子幼年丧父，不知葬在那里，长大以后多方寻访，才在防找到了父亲的墓地，于是迁来母亲的遗骨与父亲合葬。在《礼记·檀弓上》提到孔子感叹地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也。”从他这里开始，也许就封土成墓，并且要在墓上栽上树了。礼学家认为古不祭墓，祭祀祖先的活动主要在宗庙当中进行，现在看来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周礼·冢人》以爵位的尊卑为邱封之度与其树数，则士以上乃得封树。许慎《说文解字》云：“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大夫栢、士杨。”庶人之墓一般不栽树。古人看来，松柏

不朽，其德刚好配于天子、诸侯，栢树高直，象征大夫之德，士人为杨树，相对而言就比较矮小了。

三、青铜礼器的等级性

有周一代在礼器的使用上一个倾向，以使用的礼器的多寡作为贵贱的标记。《礼记·礼器》云：“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这一段话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在礼器的使用上，天子、三公、诸侯、大夫之间的等级是非常明晰的，在礼器的使用上，更是界限分明。

列鼎制度与周人的礼制是分不可开的，“钟鸣鼎食”是周代贵族生活的一种写照。除了《礼记》之外，《周礼·天官·膳夫》云：“五曰一举，鼎十有二。”郑玄注曰：“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孟子·梁惠王下》“君所谓踰者，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赵岐注：“乐正之曰：‘君所谓踰者，前者以士礼，后者以大夫礼，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3]根据考古资料，列鼎数基本上是三、五、九这样的奇数，簋则多是二、四、六这样的偶数。鼎是用来盛置牲肉的，簋则盛黍稷，二者组合也就是宴飨的象征，于是便成为贵族等级的标志，为礼器之主。

周代礼仪的使用场所，最主要的是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周代重要的大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鼎作为礼器的重要性凸现了出来。

《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关于鼎之轻重的回答，所反映的也是一个礼器在使用上的等级问题。鼎的大小是周礼体系中神圣的象征，经过王孙满的一番解释，又成了王权天命的最终载体。它由夏迁商，又由商迁周，一直被视为周礼体系当中顶级神圣的象征。

与列鼎制度同时实行的还有使用乐器的制度，即编钟和编磬的制度。

在周代礼仪当中人数也是非常重要的，孔子就曾经有“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孔子对于超越周礼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

慨，“八佾”是每列八个人，四列进行条舞。只有周天子才能进行这样的舞蹈。佾，舞列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数，如其佾数。

四、常用器物的等级性

在周代车马是非常重要的身份标志，在车马的使用上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礼记·玉藻》云：“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就是说，大夫级别的人不能够造车马，这种有东西身份的象征。《礼记·曲礼上》中也有：“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因为车马是等级身份的象征，不可以象普通东西一样赠送给别人，不然就会违背为人子要孝的原则。《礼记·少仪》云：“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这一段文字在讲乘贰车要行轼礼，所谓贰车，指的是朝会和祭祀所乘的车叫贰车，行军或打猎所乘的车叫佐车。也就是在朝会和祭祀这样的场合，人们可以拥有的副车是有严格规定的。大圣孔子上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他官位低时，就步行；做了大夫以后，出门就必须坐车了。有什么样的地位，就有什么样等级礼制的生活规格，连最得意的高足颜回死了，其父请以孔子的车为颜回的槨，孔子也绝对不肯。（《论语·先进》）《礼记·曲礼》中有：“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并且将这种行为看作是孝，正好印证了车马是有等级的，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拥有。

在《礼记》当中也有对于西周乘车用马的多少，等级分明：天子驾六，诸侯与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据考古发掘的各地车马坑，以驾二为常，次为驾四，用六马者只见于浚县辛村和虢国墓地。^[4]

可以看出，只有大夫才可以乘车，平民老百姓是不可以乘车的，否则就是违礼。在《国语·鲁语下》里也有一段话，是叔孙穆子出使楚国时，面对当时楚公子围有篡国之心的情况下，为了说明车马重要性讲的，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这里面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不同等级用车的差别，而且连车上武士的多少都作了明确的说明，足以表明当时车马制度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天子之车，据《公羊传》引子家驹语曰“大路”。诸侯的车曰“路车”，所以《诗·南有嘉鱼之什·采芣》咏“方叔涖止……路车有奭。”方叔必定是当时诸侯。咏“君子不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诗经·采芣》）大夫车曰“轩卫”，懿公鹤有乘轩者，杜注系大夫车。士的车不详何名。庶人也是有车的，所以《出车》有“我出我车”的句子。奴仆不能有车，所以管子说刑余戮民不敢畜连乘车。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车马是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在贵族等级当中，用马的多少则完全依据身份的高低来排序的。

事实上，周代人在生活上除了鼎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日常器皿，只不过是因为周人的鼎更多地是作为礼器出现的而已。在鼎之外，常见的食器有鬲和甗。这两种主要是作为食器出现的，其中，鬲主要是用来煮稀饭的，而甗则主要是用来蒸干饭的。另外，还有簋、簠、盥、敦、豆、笱、是作为盛食器使用的。作为酒器的尊、壶、罍、缶、方彝、卣、觥、爵、角、斚、盃、觚、觶、禁、鉴、盘、匜等。

正是因为器是礼的物质载体，所以各个阶层都必须严守礼仪的规定，不可以随意假于他人。管仲也讲过“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蓄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圻塋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货，财毋其禄不敢用其。”（《管子·立政》）

这一段话就是在谈器物和等级身份的关系，其中

明确表达了要以爵位作为器物使用的等级，并不是以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作为标准。可见，等级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新筑人仲孙于奚救孙桓子，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纓以朝，许之。仲尼闻之，大为叹息，说道：“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自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孔子在这里，把器与名的僭越看成是亡国的开端，常用器物是用来藏礼，如果从这里开始乱了秩序，则国将亡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周代社会中礼仪的等级性特征是贯穿于各个方面，和社会的等级性特征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社会的贵族等级特征决定了礼仪的等级性特征，而等级性的礼仪恰恰是维护周代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手段，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等级性是周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随着礼乐的崩坏，社会秩序也就日渐失序，乃至于瓦解。

注释：

- [1] 王晖：《周初改制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 [2] 徐杰令：《先秦社会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 [3] 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3页。
- [4] 陈绍棣：《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